

中国翻译的尴尬与翻译地位的提高

刘祥清,晏小花^①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文章以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与学科建设为内容,从翻译界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盘点并简要分析了中国翻译领域面临的种种尴尬。文章认为这种种尴尬直接影响着翻译的社会地位,不扭转这种尴尬局面而谈翻译地位的提高,那是不可能的。而翻译社会地位提高的关键又在翻译界内部。

[关键词] 翻译; 尴尬; 地位

[中图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3-0100-03

在中国翻译2000多年的历史中,人们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层次,接触、认识、研究翻译,对翻译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到今天,我们对翻译的定义、本质,翻译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有了较为清醒、较为科学的认识,对翻译学科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中国大陆,2004年2月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正式获准建立独立的翻译学学位点,并从2005年起招收独立的翻译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这是我国内地高校在外国语言文学专业下建立的第一个独立的翻译学学位点(二级学科)。2006年3月,国家教育部正式宣布增设翻译本科专业,并在全国范围内试点招生。到2008年元月,已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13所大学被教育部批准设立翻译本科专业。这样一来,翻译学科建设中的三级学位培养架构得以建立,翻译研究不再是语言学或比较文学下的附庸,翻译研究享有独立学科地位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历史必然”(谢天振语)。

在这种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如果我们静下心来,看看我们翻译领域内部和周围的社会生活,我们就会发现:翻译面临着太多的尴尬,翻译的地位与翻译的作用极不相称,翻译依然是未登大雅之堂的社会流浪儿。

下面以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与学科建设为内容,从翻译界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盘点一下翻译领域现在面临的种种尴尬。

一 翻译界外部给予翻译的尴尬

我们先来看看翻译界外部给予翻译的尴尬。其主要表现有^①: (1)全国范围讲,没有一个权威部门主管翻译工作和翻译事务,翻译工作基本上处于无序和混乱状态,出现“多头分管实际上无人管的局面”(李景瑞语)。因此外国民族优

秀文化的翻译引进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翻译推介工作没有规划,成绩不理想。(2)翻译成果不被承认或不受重视,翻译成果不算科研成果,翻译报酬低于创作报酬。(3)对翻译工作的国家资助和社会资助不够。举例来说,从1989年到1997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和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立项资助翻译或与翻译相关课题只有8项,平均每年不足1项。^[1]笔者查阅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www.npopss-cn.gov.cn)相关信息后发现,1999年到2007年9年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立项资助翻译类课题共21项,约占立项资助课题总数的2.3%,平均每年约两项,其中2005年6项,2007年7项,其他几年为0-2项不等。(4)翻译独立学科地位迟迟不予承认,导致翻译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严重滞后。西方比较一致承认翻译独立学科地位是在1972年,即James S. Holmes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发表题为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研究的名与实》)的重要论文之时。中国香港和台湾也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建立了独立的翻译学学位点,成立了翻译学院或专门的翻译研究机构。香港八所大学中就有七所可以授予翻译学学位。而中国大陆的翻译学科首先是外语学科下的一个“方向”,然后是应用语言学或比较文学之下的三级学科。^②这一学科附庸地位一直到2004年2月才得以改变。中国大陆到2007年才有了第一本专门论述翻译专业建设的著作,即庄智象主编的《我国翻译专业建设:问题与对策》的出版发行。

二 翻译界内部给予翻译的尴尬

(一)中国翻译史上有五次高潮。在前面两次高潮,即佛经翻译和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中,翻译纯粹是单向的,即我

[收稿日期] 2008--

[作者简介] 刘祥清(1967-),男,湖南祁阳人,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①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们通过翻译引入了佛教和西方科学技术,而到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第三次翻译高潮)时期,才有了“专办出口货”的辜鸿铭(1857-1928)。也就是说,真正让西方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开始了解中华文化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早期来到中国的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如马可·波罗,利马窦等。一个外国人站在自己的角度,出于自己的目的,介绍中国文化在内容取舍上肯定会有自己的考虑。我们的古人做得不够,我们今天做得也不尽如人意。历史悠久、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大多不为外民族所了解,导致许多本该避免的误会产生了,不该出现的遗憾出现了。这样,从翻译应起的“两个主要作用:一是促进文化交流,二是传播思想观点”来看,我们是有失偏颇的。^[2]

(二)文学翻译一直是值得我们自豪的领地,但国内译界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和对世界文学的跟踪了解等似乎都有点问题。比方说,中国翻译协会网站(www.tac-online.org.cn)有董辑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诺贝尔文学奖让我们的翻译界尴尬》。文中说,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的中国陌生化现象’说明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出了问题。一方面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局限在英、法、德、俄、西等大语种之内,在大语种之内又非常中国式地关注大国、大作家、名作家、走红作家,而缺少一种更踏实更全面更细致更负责任的学术态度;另一方面,普遍忽视小语种国家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工作,有所涉及的话也是浅尝辄止,以点带面;第三方面也是最严重的一方面是,我们的外国文学译介与研究似乎与整个西方文学的大的语境、大的走向、大的趋势发生了脱节,呈现出一种可怕的滞后和局限”。

(三)从翻译工作者应有的素质和实际翻译水平来看,一方面,由于从业人员的资格认证工作才刚刚起步,翻译从业人员中鱼龙混杂,水平参差不齐,以至口译(含同声传译)、对外宣传报道、产品说明书的翻译,社会公示语的翻译等错误频出,笑话不断,有些错误甚至莫名其妙,谬之千里。另一方面,高水平、高素质翻译人才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比方说,上海翻译家协会和上海外文出版社共同主办的“CASIO杯翻译竞赛”已举办三届,但三届的一等奖都空缺。“三届翻译大赛都无一等奖选手,显现出我国文学翻译人才已极度短缺”(黄源深语)。

(四)翻译从业人员素质和实际翻译水平不理想直接折射出我们的翻译教学和外国语言教学存在的问题。我们很多高校的翻译类课程的设置和教学都是为语言教学服务的,翻译教学是语言教学的一种手段,社会对此越来越不满意。刘重德老先生早在1994年就指出了我们英语专业翻译教学在课程开设和课程教法方面的问题,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3]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情况虽有好转,但依然不容乐观。看看这些年来几家主要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的题目就可见一斑:《文汇报》2001年刑晓芳的文章题目为“图书翻译质量堪忧”,《中国质量报》2003年王越的文章题目为“图书翻译要设质量关卡”,《光明日报》2006年赵婧的文章题目为“反差:八千学子习外语,翻译人才缺九成”。

(五)翻译出版界要打假打非的还很多,如抄袭、剽窃、盗印、粗制滥造、重复出版、侵权使用等等。这些现象已引起读者、译者和出版界的强烈不满。^[4]

(六)翻译理论研究,相对于翻译实践来讲,更不受社会重视。翻译理论无用论在我们翻译界内部也曾流行一时,甚至出现过“有能耐的搞翻译,搞不了翻译的教翻译,教不了翻译的教翻译理论”这样的怪腔调。

(七)翻译理论工作不力。传统翻译时期,所谓的翻译理论停留在随感记录或经验总结层面,没有升华。传统翻译理论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但又常常深陷其中,不能自立,如传统翻译理论中的很多术语直接取自于中国古典文论、古代哲学和古典美学,借用术语而又不加界定,导致术语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随意性大,科学性弱。在学习译介西方翻译理论上,早期局限在一家一言上,全面性不够,以至一段时间里出现“译必称奈达”的不成熟现象;后来又出现盲目引进、不求甚解,术语堆砌,内容空洞等现象。

(八)尽管翻译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解放后通过两次大的论战,我们对翻译学的学科性质有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但翻译学科建设之路并不平坦:我们时不时地纠缠在翻译理论“中国特色派”和“共性派”的争论之中,纠缠在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的无谓争论中;如果一个人没有可以炫耀的翻译实践成果,我们甚至不能允许他谈论或研究翻译理论,对这些人不是持允许、鼓励的态度而是持冷眼相向、甚至嘲笑的态度;翻译批评是推动学科建设的有力武器,在对待翻译批评这个问题上,有些人口是心非,说别人是一套,轮到自己头上就脸红脖子粗,而不是言行一致,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以学者的态度,在学术层面上进行和面对翻译批评。

(九)谢天振著文指出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存在三大误区,虽然沈苏儒曾对这三大误区当时是否存在提出过质疑,但笔者认为这三大误区确实或早或迟、或多或少地存在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已经消除了,有些却依然存在。

(十)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中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翻译领域中的学术腐败。季羨林老先生早就批评了两种翻译腐败现象。与今天的翻译腐败相比,它们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今天的翻译腐败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和翻译出版物中的抄袭、剽窃、侵权使用;二是雇佣“枪手”,实行论文和出版物的“有偿转让”;三是翻译中粗制滥造,劣质译著充斥市场,成为我们遭遇的“另一种学术腐败”。翻译腐败的主人为名为利,失去了学术操守,放弃了道德底线,害人害己害翻译。

三 翻译地位的提高

翻译领域现在面临的种种尴尬,仔细分析起来,都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我国传统上是一个非常轻视理论研究的国家。这种弱点根深蒂固,深深埋藏在中华文化的底部,或者说融化在中华文化的血液里,自然对翻译理论研究也会产生消极影响。“传统译论在充分享受其美学优势的同时,也把自身的缺陷显露无遗:一是‘就美学体系而言,各种议论之

间仍存在着间断性和非系统性';二是'传统译论虽然抽象地反映了美和翻译艺术,却没有对其中的具体因素和复杂关系作多边探求和立体研讨';三是'我国的翻译理论在思维模式上更倾向于从主观的而非客观的、感性的而非理性的、体验的而非分析的角度来品评翻译和译品'。〔5〕轻视翻译实践,不重视翻译成果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孔子在《大戴礼记·小辨》中称翻译为“小辨”,视翻译为“小道”,这种对翻译的轻视态度直接导致了我国翻译史上崇创作轻翻译的错误思想的形成和蔓延,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20 世纪初出现的翻译“媒婆”论,明显流露出了对翻译的鄙夷态度,是孔子的翻译“小辨”论和重创作轻翻译思想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延续。

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中国翻译却顽强地发展着,并且取得了成绩,成为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东西。笔者在上文中列举了我们翻译实践和理论与学科建设面临的尴尬,其目的不是要否定我们在翻译领域的成绩(实际上,翻译的作用和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也是任何人无法否定的),也不是怨天尤人,指责翻译界外部对翻译的不重视,而是斗胆指出这些不足:一是让翻译界外部更好地了解翻译领域,更多地给予翻译以支持;让翻译这棵古老而又恰逢甘露、新芽待长的大树在一个合适的生存、生长的环境中绿意葱翠、枝繁叶茂,以至成为参天大树;让翻译之荫惠及全社会;二是让翻译界内部,包括译者和所有译界从业人员,认清自己的不足,从我做起,义不容辞地承担自己的责任,多向译界前辈学习,少些尴尬,多些对翻译大树新芽绿叶的爱心和呵护。其最终目的在于提高翻译的社会地位。

关于提高翻译的社会地位,许多学者(如赵纯厚,爱波斯坦,林戊荪,沈苏儒,李景瑞,沈苏儒,张国敬等)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给出了具体可行的解决办法。笔者认为,从以上罗列的翻译所面临的尴尬来看,无论在翻译实践还是在翻译理论与学科建设方面,翻译界内部给予翻译的尴尬更多、更致命。也就是说,翻译社会地位现状主要是由翻译界内部的很多不足和太多尴尬造成的。这些尴尬直接影响着翻译社会地位的现状及其今后的提高。不扭转这种尴尬局面而谈翻译地位的提高,那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提高翻译的社会地位,不能仅仅是呼吁,寄希望于翻译界外部的条件改善(当然这也是我们应做的工作之一),其关键在于两个方

面:

一是,在政府没有设立专门机构管理翻译事务以前,各地译协组织应肩负历史责任,加强翻译界的联系与合作,开展行业调查研究,加强行业自律,规范行业行为,维护翻译工作者的合法权益;各地译协组织还要在翻译培训、翻译质量指导、译著出版监控与把关、翻译类弄虚作假文章的查处和翻译腐败惩治等方面加强领导、发挥作用,以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让正义公正大行其道,让翻译不正之风和学术腐败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二是翻译界内部各位翻译工作者要适应社会需要,加强自身建设,切实提高自身素质和水平,扎扎实实、脚踏实地地耕耘翻译这片沃土,做出自己的成绩来,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以此来赢得(而不是乞求)社会对翻译的刮目相看,赢得社会对翻译工作者的尊重;翻译界内部各位同仁切不可粗制滥造、急功近利、追名逐利、更不能剽窃侵权、投身腐败、自欺欺人,搬起石头既砸了自己的脚,又砸了翻译的牌子、败了翻译的名声。只有这样,翻译地位的提高才能水到渠成,指日可待。

注释:①文章在列举中国翻译的尴尬表现时参考了爱波斯坦、林戊荪、沈苏儒(2000),赵纯厚(1995)李景瑞(2000)沈苏儒(2002),张国敬(2003),季羡林(2007)等论文和《光明日报》等相关文章。

②20 世纪 90 年代初,“翻译理论与实践”作为二级学科曾短暂出现在研究生招生目录中,但随即被取消。

[参考文献]

- [1] 许 钧,王克非. 近年来国内立项的翻译研究课题评述[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1):39-44.
- [2]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3] 刘重德. 翻译论稿[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12.
- [4] 李景瑞. 当前翻译工作的问题与呼吁[J]. 中国翻译,2000,(5):2-3.
- [5] 张柏然,张思洁. 翻译学的建设:传统的定位与选择[A]. 张柏然,许 钧. 面向 21 世纪的译学研究[C]. 上海:商务印书馆,2002.

Translation in China: its Embarrassments and Social Position

LIU Xiang-qing, YAN Xiao-hua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ranslation practice, theoretical study and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lists the embarrassments facing translation in China from both outside and inside of translation world, and gives a brief analysis of why the embarrassments come into being. It is held that these embarrassments lead directly to the low status quo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it's impossible to improve the present status quo without change of the embarrassing situation, and the key to the improvement lies in the inside of the translation world.

Key words: Translation; Embarrassment; Social Position